

中国

究竟在哪里

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 著

Zhongguo

Jiujing zai Nali

学林出版社

中国

究竟在 哪里

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究竟在哪里? / 上海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2

ISBN 7 - 80668 - 680 - 0

I. 中... II. 上... III. 经济发展战略—战略地位
—研究—中国 IV. F1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6179 号

中国究竟在哪里?



- 作 者—— 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
责任编辑—— 曹坚平
封面设计—— 鲁继德
责任监制—— 田振军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5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4.4 万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68 - 680 - 0/F·52
定 价—— 22.00 元

编委成员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领导及特邀研究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万存知	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	吴 强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
王 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常务 副秘书长	张承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
王子先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	汪同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 研究所所长
王德培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	邱晓华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秘书长	来光贤	中国工经联信息工作委员会 主任
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	周宏仁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高级顾问
卢民锋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周 望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所长	郑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刘福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	郑 杨	首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刘 鹤	国务院信息办副主任	郁鸿胜	上海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刘尚希	国家财政部财政科研所	贾 康	国家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
李泊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	贾大明	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与开发中心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 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高吕英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
李富强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夏 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所长
沈明宏	科技部高技术研发中心	顾云吕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
何万蓬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助理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
严先溥	国家统计局贸经司	徐宏源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	谢 平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杨勇武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助理	管再祥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
杨国振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助理	温铁军	《中国改革》总编

目 录

序言

第一编 中国究竟在哪里？

第一章 理论争鸣中的中国	3
一、对发展问题的强烈忧患——《山坳上的中国》	3
二、转型期经济问题的伦理追问——《现代化的陷阱》	5
三、中原乡村社会的信史——《黄河边的中国》	8
四、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长江边的中国》	11
五、典型观点评述	14
第二章 “T”型中国	23
中国究竟驻在哪一边？——黄河、长江、大海？	23

第二编 沿海增长极

第三章 海边经济带	37
一、区域整合的三个火车头	37
二、把中国“倾斜”在海边的“五桥一隧”	40
第四章 竞合时代	47
一、“概念经济”终结	47
二、产业之争	50
三、区域整合中“看不见的手”	53
第五章 迷失的城市化	70
一、游荡的城市灵魂	70
二、城市战略抉择	73
三、产业空心化之于城市	78
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城市同构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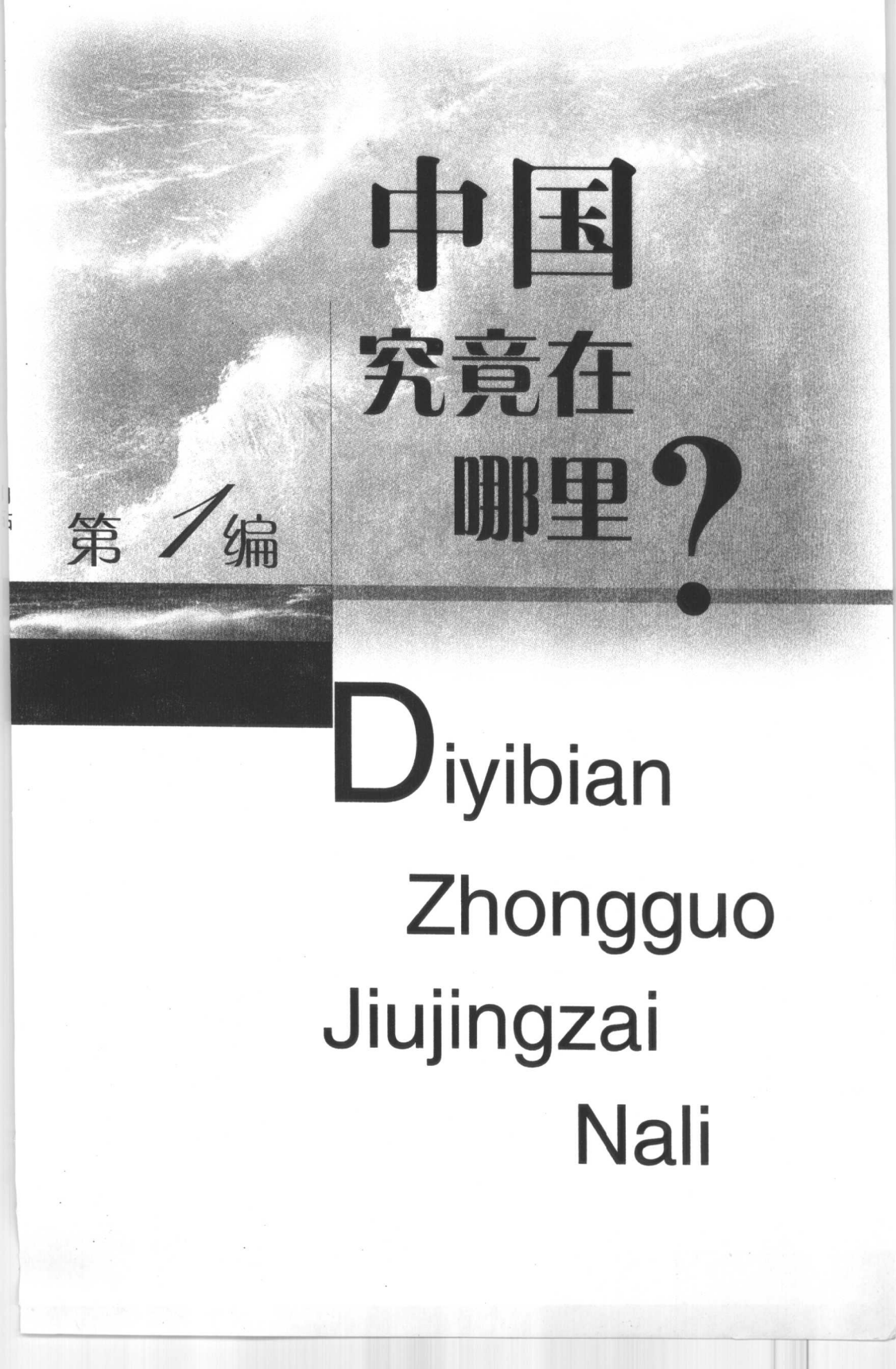
第三编 中国经济地壳难以承受之重

第六章 地壳折断	101
一、经济话语权的大切换	101

二、区域整合中的盲点、敏感点及增长点·····	103
三、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	106
第四编 声“西”击“东”，北部开打，何日中部	
第七章 西部开发·····	135
一、理解西部大开发的背景·····	135
二、开发西部七本账·····	137
三、西部大开发要义——挑战自己·····	139
四、现实对判断的验证·····	142
五、西部开发前景·····	144
第八章 中部崛起·····	158
一、下一轮国策行情：中部崛起·····	158
二、中部夺路的方向·····	160
第五编 断裂中国的弥合机制	
第九章 错位看中国·····	171
一、形势变化很大，立场变化很小·····	171
二、“福卡”眼中的“问题与关键”·····	174
三、中国经济的独特魅力：五个“差”·····	177
四、不在方向在节奏·····	179
五、明里和暗里——法眼无边，表里有界·····	182
第六编 游走的中国	
第十章 宏观中国·····	195
一、经济大棋局·····	195
二、经济战略部署·····	198
三、“区域整合”的国策展望·····	201
四、政治经济的新关系	
——经济增长遭遇地缘政治思维·····	204
第十一章 战略中国——第三板块的崛起·····	218
一、远东新格局·····	219
二、中国东北亚战略的重大抉择·····	221
三、中国对外战略将由不结盟到结盟？·····	223
四、“10+3”下的东亚经济新格局·····	225
第十二章 引导国际政治潮流·····	247
一、从“国际政治”到“世界政治”·····	248



二、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冷战	250
三、21世纪的战略新格局	252
四、中国变化新空间	255
五、新政治哲学	257



中国 究竟在 哪里？

第 1 编

Diyibian
Zhongguo
Jiujingzai
Nali





第一章 理论争鸣中的中国

一、对发展问题的强烈忧患——《山坳上的中国》

预测之难在于历史有一天会验证它是否正确。20世纪80年代末,何博传先生站在一个时点坐标上,以其横跨数理、哲学领域的学科背景和广博的知识,使《山坳上的中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其犀利的笔触直指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痛,言他人所不敢言,从危机入手对当时中国经济理论、三大产业、区域经济、能源、交通、生态、教育、管理、人才、信息化等诸多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全书超越了纯理论范畴,试图在实际问题累积的社会发展中探询出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并以子规啼血、忧国忧民的学者之心期望引起整个社会对潜藏危机的重视,“促进国人奋起,上下一心,共闯难关”。而主流经济学界对这类问题的集体失语状态使何博传先生的《山坳上的中国》一书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书成书之际正值中国处于一个敏感点和转折点,可算作其时其地存在问题的集中展示。而今温故再读,比照现实,能够看到一些问题已经在发展,如经济理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理论学界在所有制类型、资源配置和过剩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全新的理论指导,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做出有目共睹的努力,知识的价值正在被全社会认同;一些问题有所缓和,如交通,13年间,中国基本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高速公路从不到300公里增加到19453多公里;还有一些问题继续存在,如能源,虽然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已有提高,但与人相比差距犹在,2003年夏全国19省市突陷“电荒”,再凸能源瓶颈;21世纪石油战略也正式提

上日程。还有非常不幸并仍有漫延态势的问题,如生态,长江洪水,黄河断流,北方沙尘暴,大面积干旱,森林遭破坏,草地沙化,湖泊缩小或消失,水源污染,水资源严重短缺,等等,有加剧倾向。最新的例证是2003年全国26个省(区、市)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害,民政部截止到7月22日的初步统计数字为1.5亿人(次)受灾,各类直接经济损失652.2亿元。事物的动态演进特征使所有的预见都有可能被否定,而像何博传先生有如此之多的“先见之明”并且至今仍然具有适用性,实属不易。

苛求作者所有的认识都精准到位无疑有失科学原则。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单纯以悲天悯人情结看待中国问题除了引起百家争鸣之外,对于问题的解决有多大效果值得怀疑。只是用“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维分析现实不可避免会出现囿于其中、就事论事、划定在有限边界内不能自拔的情况,而实际上中国更需要战略。就此,不得不说对重要发展机会的误判是《山坳上的中国》的最大遗憾。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是转型期中国的一大特点,无论“猫论”、“摸论”还是“不争论”,都是邓小平针对问题中国的智慧结晶,也是最有成效的不得已之选。改革开放使中国避免了闭关锁国、自娱自乐的发展方式,融入“国际大循环”又使中国适时搭上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快车,“世界大工厂”雏形初现。显然《山坳》的作者对中国在国际分工中能有今天的位置未能料知,书中质疑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并对2000年出口额能达到1500亿美元不屑。从统计数字看,2000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额为2492亿美元,高出预计数字将近1000亿美元,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功不可没。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预示着一个新时期开启。2002年外贸进出口再创新高,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据半壁江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次被验证。

另一个重要机会是信息时代,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惊涛拍岸。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落后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人有我无,需要奋起直追,而机遇在于中国可以绕过他国走过的弯路,直取目标。现在计算机被广泛应用、因特网联接世界,地球空间概念急速缩小,信息化改变了原来的工作、生产甚至生活方式,这在十几年前确实不可想象,庆幸的是中国在关键时刻抓



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有人曾撰文指出,中国在历史上错失过三次战略机遇期,一次是郑和下西洋,一次是中日洋务运动竞赛,最近的一次是在美苏冷战对峙中仅把握住一半。“时来易失,赴机在速”,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留给中国的机会实在已经不多。

既要解决历史问题,又要抓住未来机遇,中国必须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腾挪有度,平衡有方。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试数一下,现在的贫富分化、区域失衡、三农、能源、生态、教育问题等个个不容轻视,单举其一就足以让人心惊不已,但是也应该看到体制改革、人才回流、科技进步的良性发展。毛泽东早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天,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说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貌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不能说他老人家的预言已经兑现,但中国的进步举世瞩目。“危机”二字拆开来看即危险与机遇,这是求解中国问题的精妙所在。经济发展如同一场没有止境的马拉松,伴随它的研究亦如是。

二、转型期经济问题的伦理追问 ——《现代化的陷阱》

相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们的深奥专著来说,1998年出版的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无疑赢得了巨大的读者群。正如作者本人预想的那样,“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其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非常可观。

《现代化的陷阱》面世后曾引起当年经济学界的激烈论战,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对“不道德”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严厉批判,指责他们“缺乏人类关怀精神”。作者在该书的前言结语中反复强调,本书旨在“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要为‘没有良心’的经济学研究呈现它应有的良知。经济学家作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计划者和顾问,对现实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选择产生着影响。如果对财富的占有不进行伦理追问,将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而流于纯技术

性操作”。

作者还在后来的“长江读书奖”颁奖会议上说：

作为一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我有幸地经历了三个时代：文革前、文革以及后文革的改革时期。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实际上起作用的社会意识其实都很不相同。我认为，这样一个丰富多变的社会转型期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来说，都提供了内涵无限丰富的研究对象。我所做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受过教育的人们讲述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无论是上述的获奖致辞还是《现代化的陷阱》的书稿，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忧患意识飘荡在字里行间。显然，作者对“人类关怀”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经济学本身的兴趣。由此可以判断，她之所以从事经济学研究，与其说是出于求真的欲望，毋宁说是出于求善（价值判断）的需要。中国古人说“士志于道”、“游于艺”，或说“格物致知后言道”，都把做学问当作一种达“道”的手段，同样作者也把经济学研究作为“艺”，目的在于“道”，即维护所谓的公正的社会价值标准。

书中虽然提出和讨论了一些重大而尖锐的现实问题：股份制在中国“准桔成枳”的变种，房地产的“圈地运动”，国有企业改革的老大难问题，用寻租理论解剖的腐败毒瘤，当代原始资本积累和市场游戏规则的破坏，众目关注的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人口、就业和犯罪问题，农村宗法组织、地方恶势力的形成，黑色经济的活跃势头，等等，但是我们既看不到这些问题的历史演变，也看不到它们的未来发展，其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的逻辑连贯性、系统性和经验可证伪性，更是无从谈起。

换句话说，作者的写作方法就是：首先收集和列举大量资料和案例，包括报刊杂志上公务员、工商界人士、律师、新闻界、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案例和观点；然后指出这些资料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仅有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文化的、伦理道德的，它们在相当程度



上扭曲了诸多改革政策的基本意图，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的发展构成了极大障碍”，“尤其是腐败问题，甚至有可能葬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该书的副标题为“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最后作者认为：“这些综合的社会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学家能够独立解决的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将伸向何方，完全取决于中国如何解决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中隐含了一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内核，必须要超越经济学范围去进行伦理追问。”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来不缺问题，更不缺少批判者和反思者。我们欣赏那些批判者的勇气 and 责任感，但如果用科学和理性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现代化的陷阱》，那么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批判视角具有片面性，论证方法缺乏实证性，所下的定论是有偏差的。

作者认为大量事实表明“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亘于非经济领域。在约束软化的情况下，部分政府官员对法规的遵守陷入了一种非常随意和松弛的状态。权力层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行为对下层广泛渗透，导致了当代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由于市场缺乏伦理规则的约束，我国经济出现一种过度投机的状态。”

的确，在新旧体制交锋和切换过程中，计划的机制在隐退，市场的机制尚不到位，产生的权力真空和断层就是变形的手操纵利益分配进而滋生腐败的肥田沃土，也是某些既得利益者趁旧体制大船将沉未沉之际完成一夜致富的最后机会。但这只是经济改革中的阶段性特征，如果把这种阶段性的特征当作终极结果，把支流当主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于是在放大市场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视而不见经济增长的巨大成果和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就如盲人摸象般以偏盖全，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谈不上是对中国现实的战略思考。

而且在批判了流行一时的“腐败有利论”、“高薪养廉论”后，作者给出的拯救疗方却是呼吁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哲学家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上至总统政要，下至七品小官，权力一旦和人与生俱来的私欲结合就会源源不断地续写“人为财

死,鸟为食亡”的灰色历史。如果继续悲壮地把源自社会制度缺陷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寄托在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人文精神之上,对解决现实问题究竟有多大帮助呢?事实上,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消除腐败的根本不是缘木求鱼,而是涸泽而渔——消除权力市场化的环境,然后一网收尽。

文风朴实是该书的写作优点,也是赢得大批读者的关键之一,但反过来也恰恰是它的致命伤,因为它搀杂了相当程度的情绪化渲染,用过激的言辞来替代深刻的论证,虽然能有效地激起读者的阅读快感,但其分析的过程是非理性的。比如,书中把“拥护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万能”;把“保护私有产权”等同于“化公为私”,抽掉了这些理论的具体语境,极而言之简单化处理。

通观全书,主要内容锁定在中国由一次改革向二次改革深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挑起了社会各界对某些敏感话题的争论以及进一步探索的欲望,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过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经济学家中的纯乐观派具有醒示作用。当然,限于作者本人术业有专攻,视角有偏差,过分苛求其学术观点的质量也是不合适的。我们对真理的探索应是永无止境的。

三、中原乡村社会的信史——《黄河边的中国》

追溯到新中国刚成立时,4.5亿同胞1/8是非农人口,大约5625万;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镇人口45594万,50多年绝对增长近4亿,其中除了非农人口自然繁衍的部分之外,余下的都是从农村转出的。数以亿计的村里人不管以怎样的方式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旦走出那块曾经让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土地,农村便渐行渐远、日益模糊。现在的农村到底什么样、农民是怎样生活的、农业存在哪些问题等,好像谁都可以说两句,又都说不清楚。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某些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可能得来的只是一些难辨真伪的信息,针对“三农”问题挥洒而就的文字显然失掉了与农民血脉相连的深刻渊源。一定程度上,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可对以上缺憾稍加弥补。



1996年,作者历时数月深入中原农村,通过特别的考察方式以亲身取得第一手资料,翔实地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生活原貌,直观社会,在“官语”和“译语”之间寻求第三种语言,可称得上是一部现代农村的全景写实。

农民真苦、农民真难。从“官语”来看,现在最突出的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资料表明,1997年至2002年年均增长率低于5%,而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绝对额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一半;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是1:3.1,消费差距更高达6:1,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从书中来看,收入问题好像还不是最头疼的,农民抱怨最多的是负担过重,最痛恨干部腐败。原因如下:基层部门机构膨胀。十几年时间里,仅县乡两级吃财政饭的增长了3~5倍;干部追求“装备”现代化,公务开支大幅增长;“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的政绩工程打着富民的幌子造成大量资金浪费,而这些巨额费用无一例外都会体现在“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农民眼中,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超出期望,当官不办实事,借名目谋私利就属腐败。从下往上看,不能说农民的认识有误,而站在整个中国发展的角度又可见事物的另外一面。

胡鞍钢曾经将一个中国描述成四种社会,分别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 and 知识社会,形象地说明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改革开放前,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加快工业发展,农业反哺工业,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等制约了农民向工业的转移,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村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使本来贫困的农村变得更加贫困;改革开放后,尽管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释放了农业生产动力,但上述政策的影响对农村发展依旧存在着约束和限制作用,使旨在减缓农村贫困的扶贫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三农”又是历史遗留问题。

世界银行2001年1月重新严格地对贫困进行了定义,贫困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是缺少机会参与经济活动,如果机会就在那里,你不接受,那么就是选择的问题,和贫困问题无关了;第二是在一些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第三是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例如疾病、粮食减少、宏观经济萧条。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农村的贫困内涵,焦点似乎更加集中在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黄河边的中国》之所以能

够引起诸多关注,就是因为外界对农村的一知半解,那么可想而知,农村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切实保护了农民的权益。

“三农问题”是各种错综复杂原因的集成,很难断定它的具体成因。要给这样盘根错节、头绪繁多、涉及面广的领域开出治病良方绝非易事。曹锦清先生在经过“长久思考”之后列出了自己认为类似“痴人说梦”的六大建议,“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

毋庸置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原来的手工劳作,生产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大影响,由于农户之间的关联度降低,相互独立性增强,原来因血缘、乡邻等关系形成的互助互帮的亲情纽带也不断松动。书中提及村民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感觉是“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风气变坏”,既是对前面改革成果的肯定,也是因传统小农思想受到冲击而带来的不适。现在农村要走城镇化道路基本上成为共识,有关专家估计,未来20年内将有3亿农民要进城。从这个角度来说,抛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方式和观念将是农民不得不走的一步。

现代企业制度将产权明晰作为一大前提,而在农村,土地一直在集体名义下存在。城镇化既是农民进城的过程,也是农村土地需要进行重新理顺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土地即是农民的“社保”,是目前推进城市化不得不解决的重大课题。从最近的信息中可见国家政策的调整倾向,征地补偿制度苏州试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措施基本上明确了土地是农民的“养命钱”,并尝试以市场经济的“三公”原则解决农民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称:改革开放以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随着改革政策的逐步到位,失血的农民将有望止血。另一方面,乡村直选反映着最基层的民主政治变革,表明农民的发言权会越来越大。其实无论是新土地改革还是乡村自治、户籍放开等一系列的动向都是对农民本该拥有的权利的偿还。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式、方法会很多,也没有必要将它们都归结为至上真理。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农民将来走合作之路还是单门独户完全因时而异。有